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通史．卷一，先秦/段渝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3
（四川通史/贾大泉，陈世松主编）
ISBN 978-7-220-08058-6

Ⅰ.①四… Ⅱ.①段… Ⅲ.①四川省—地方史—先秦时代 Ⅳ.①K2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0207 号

SICHUAN TONGSHI
四川通史（卷一 先秦）
段 渝 著

责任编辑	何昌宇
封面设计	敬人书籍设计
技术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袁晓红
责任印制	祝 健
部分图片	罗韵希 帅初阳 武 韵
摄影作者	黄晓帆 帅黎明 胡翠兰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 2 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森广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30mm
印 张	31.75
字 数	518 千
插 页	8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8058-6
定 价	860.00 元（全套共七卷）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一

先秦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伟大时代，也是四川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伟大时代。

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巴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组成部分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不论在中国文明的缔造还是中国西部开发史上都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明是由各大区系古文明多元整合、一体发展凝成的，巴蜀是其中的重要区系，有着悠久的始源、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类型，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是中国早期区系文明中具有显著地域政治特征和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由于巴蜀从史前到文明的演进同时也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和社会形态的演进，因此先秦巴蜀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中国西部长江上游早期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的历史。

二

对于尚处在童年时代的史前人类来说，自然和生态环境具有较之任何其他

历史时代更加重要的意义。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土壤、水文、动物、植物、矿藏等因素，对于史前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以至对于古代文明是否能够起源和形成，都有着特别重要的直接的影响。

四川盆地是一个标准的菱形盆地。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使盆地明显地呈现出一个从盆周山地向着盆底逐渐下趋的向心结构，而河流也随之形成不对称的向心结构。正是这种地理上的向心结构，加上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盆地不断地吸引着周围边缘山地经营高地农业以及其他经济类型的族群向低地发展定居，吸引着各种古文化沿着下趋的河谷和山间谷地所构成的向心状地理结构走向盆地中部，从而为各种古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为新的古文化中心的形成提供了自然基础。于是，在这个地理单元内，古文化的发展轨迹也就相应地呈现为一个向心结构，推动了置身其中的各种古文化之间的交流、激荡与融合，对古文化的发展、演进以至文明的起源产生了无可置疑的重要影响。

在四川文明的起源时代，四川的古文化分布相当广泛，西起川西北高原，东至长江三峡，北达秦巴山地，南及川西南山区，文化遗址和地点星罗棋布，表现出极为明显的新石器革命浪潮的性质。它不仅把人们推向四面八方，而且在浪潮波及的每一个角落都发生了普遍进步。

四川新石器革命造成了不同类型的生产性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有盆地原始农业经济和高原原始畜牧业经济两大类型，而间以渔猎经济这一更为古老的经济形式。原始农业经济可从各地所出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窥其梗概，各遗址所出大量陶器和家畜遗骨也是具体的证明。原始畜牧业则不仅见于古代文献，而且得到了考古学的充分证实。考古资料还说明，商品交换关系在各种生产性经济区域之间开始初步发展起来，各地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

四川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结构，总的说来还没有形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不过，贫富不均、等级划分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阶级分化开始出现，甚至出现了史前酋邦一类政治组织。而它的质变，即阶级社会的诞生和国家的形成，则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最重要标志。

三

蜀是一个历史悠远的文明古国，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已见称于世，而它的早期发展，则与黄帝、颛顼、大禹等中国古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紧密相关，有着深厚而久远的历史根源。透过古蜀与这些英雄人物关系的历史传说，可以看出中国古史传说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厚的西部文化底层，看出中国古史的西部底层是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层累地积淀起来的，它们便是中国西部文化的原生底层。这一原生底层在中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发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致成为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和里程碑。正因为古蜀在中国古史的原生文化底层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不说，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对中华古文明的缔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在古蜀史上的文明起源时代，古蜀地区有蚕丛、柏濩、鱼凫等三代蜀王。三代蜀王的历史，是一部文明要素逐个产生的历史，也是一部古蜀酋邦形成演变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关键时期，由于古蜀酋邦之间征服战争的发展，终于导致古蜀社会从酋邦演变为国家，从而开创了古蜀文明。古蜀王国定都于今广汉三星堆遗址。于是，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大地上，一个以鱼凫王为统治核心的古蜀王国建立起来。

三星堆文明是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创年代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稍晚于中原夏王朝的创立，而它的终结在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商王朝的晚期。三星堆古蜀文明雄踞西南，连续发展约千年之久，这对于一个文明古国或古王朝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不多见的。

古蜀之所以能在距今 4000 年前就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它深深地植根于博大而深厚的基础分不开，即它是来源于农业的长足发展、手工业的巨大进步、商业贸易关系的广泛建立、科学知识的积累创新，以及与其他古文化的密切联系和交流。

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黄金制品和大型青铜器群，气势宏伟，蔚为大观。其中的青铜雕像群，如青铜大小立人、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神树，以及金杖、金面罩等，都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稀世之宝，不论在科学还是

艺术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大批玉石礼器和陶、漆工艺品，都展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平，从而体现出细密的分工和生产的专门化。青铜器制作所必需的采矿、运输、冶炼、合金、铸造加工等环节，也无一不是分工协作的坚强证据。可见，经济部门的分化，大批脱离食物生产的手工业者的技术专门化，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知识、技术和生产者队伍的雄厚基础。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背上多有穿孔，学者们多认为是贝币，反映出商业的繁荣。而海贝本身，以及六七十支象牙，也正是远程贸易的实物见证。青铜器所必需的铜料锡料，也是通过贸易进口的。这些说明贸易已不是偶然现象，它已从获取生产原料进一步发展到获取王权所及的一切奢侈品。

丰富的科学知识、高超的技术和伟大的艺术，共同融进作为创造性产物的各种物质形式之中。从金玉到陶石，从青铜器到建筑物，都是它们直接而具体的表现。其中也包含不少通过交流从中原甚至外域移入的文化因素。正是由于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才使古蜀文明具有世界文明的色彩，使它成为一个富于开放性特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三星堆文明又是上古四川盆地及周边各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成果。例如，文献记载古蜀文化的初创者三代蜀王，来源于岷江上游地区；而四川盆地以北的陕南汉中盆地，以东的长江三峡以至鄂西宜昌地区，以南的大渡河和青衣江地区，又是三星堆文明辽阔的空间构架中一个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这就表明，三星堆文明的创造，一方面是古蜀史前文化高度持续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同其他文化因素的多元性来源分不开。因此，三星堆文明的基本结构框架，同样是多元一体，而不是一元形成的。

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尤其是一、二号祭祀坑的相继发现，解开了古蜀王国的王权与神权之谜。它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夏商时代的古蜀文明，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神权文明；夏商时代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实行神权政治的国家，三星堆遗址便是这个神权文明的政治中心之所在。

在古代蜀国的历史上，史前至夏商时代，有蚕丛、柏濩、鱼凫三代蜀王的角逐争雄和鱼凫王朝的建立；商周之际，有杜宇取代鱼凫为蜀王的王朝代兴；春秋早期，有开明取代杜宇的帝位“禅让”；最后是公元前 316 年秦惠文王伐蜀，灭掉开明氏蜀王国，从此结束了古蜀国雄踞西南的历史，归于秦的一统天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杜宇、开明时期的蜀王国，不论在国家形态、政治制度还是文化模式等方面，比起以三星堆文化为内涵的鱼凫王朝来说，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些变革，从政治制度上看，是以官僚政治取代了神权政治，从文化模式上看，是以礼乐文明取代了神权文明，从而在国家与文明演进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开明王朝是古蜀最后一个王朝。在开明氏统治时期，蜀王国不仅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而且在当时南中国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中，扮演了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角色。同时，由于开明王朝的扩疆战略和经济文化建设，又对秦汉及后世我国西南地区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对成都取得西南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

蜀东抵巴，北界楚，西邻秦。在古蜀王国历代王朝上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先后与中原夏商周王朝和巴、楚、秦等诸侯国均发生过若干关系。其中既有和平的交往，又有战争的对抗。和平与战争的交替，构成蜀与列国关系的基本内容。

公元前 316 年秦并蜀后，据蜀以为东进伐楚的战略基地，得蜀之美丽江山，丰饶物产，有其粮食、布帛、金银，极大增强了秦国实力。《战国策·秦策一》载：“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为秦国统一战争的胜利开展提供了坚实而广阔的大后方，并促使青铜时代的古蜀文明逐步融汇到铁器时代统一的中国文明之中。

四

巴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这个名称包有地、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

巴地，有广、狭二义。狭义上的巴地，是指姬姓巴国之地，初位于汉水上游陕东南地区与大巴山之间，是著名的“汉阳诸姬”之一，后辗转南迁到长江流域鄂西、渝东和四川盆地东部。广义上的巴地，则随时代的变化而广狭不一。

巴国，是指以姬姓巴王族为主体，并包括版图内的其他族群，在先后以陕东南和四川盆地东部和鄂西为中心而其四至因时而异的地域范围内所建立的国家。但不同时期，由于巴疆范围的不同，巴国的范围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多数情况下，当巴疆缩小后，其故地仍可称巴。如汉中属秦后，其地仍有巴称。反

之亦然。

巴人，是泛指生长在巴国和巴地范围内的所有人。古代巴人是由多支族群所构成的来源多元化的亚民族集团，其中的每一支系都是这个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文化，有三个不尽相同的概念。战国以前的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是有区别的，巴国文化是指宗姬一系的巴国王族的文化，巴地文化则是指巴地各族的文化，春秋末战国初巴国从汉水上游南移长江干流，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才结合起来，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因此，巴文化含有巴国文化、巴地文化以及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等三个不同的层次。

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是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复合共生的地域文化概念。春秋战国之际巴国从汉水上游南迁长江干流两岸巴（西陵）、巫、夔峡地区和四川盆地东部地区，成为当地各族的统治者，于是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始多元共生，从复合、耦合到融合，两种不同文化的空间构架由此基本重合。到这个时候，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才合二而一。这个时候的“巴文化”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可以用“巴”来涵盖并指称国、地、人、文化的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文化概念，从而形成巴文化区。

巴文化区的地域范围，大致上北起汉中，南达黔中，西起川中，东至鄂西。它的基本特点：一是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多刻铸在青铜器和印章上；二是巫鬼文化异常发达，以至在四川盆地东部和鄂西尤其三峡地区形成一个颇引人注目的巫文化圈，传奇甚多，来源甚古，与众不同；三是乐舞发达，人民能歌善舞，其青铜乐器以錞于为重器；四是崇拜白虎与畏惧白虎信仰的共生和交织；五是具有丰富而源远流长的女神崇拜文化传统；六是“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等等。

在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代，古代文明的一些要素开始在峡江巴地出现，成为巴地古代文明的曙光。到商周时代，早期青铜文化开始在渝东长江干流地区萌芽，昭示着早期文明的起源。东周时期，由于巴国文明的南移、进入与推动，巴地的青铜文明进入全盛时代。

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巴国，是指与西周王室同姓的姬姓巴国。早在殷商时代，巴国已见称于世，殷卜辞称为“巴方”，是商代很活跃的一个方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西土之师东伐殷纣王，巴师充当前锋，勇锐无敌，歌舞以凌，致使殷人前徒倒戈，对西周王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所以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周

武王分封宗姬于巴，成为最早受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之一。

春秋时代，王纲解纽，诸侯逾制。巴国在周王室礼崩乐坏的形势下，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也急剧膨胀，图谋东出汉东，扩张江汉，因而一度与楚结成联盟，扫荡江汉间小国。后来盟约破裂，巴、楚反目为仇，数相攻伐，巴慑于楚之锋芒，被迫放弃汉水上游故土，南下长江流域，转入渝东长江干流和四川盆地东部，重建统治。

战国时代，巴在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五易其都，先后在江州（今重庆）、垫江（今重庆合川）、平都（今重庆丰都）、阆中（今四川阆中）、枳（今重庆涪陵）建立都城。巴国五次迁都，都同当时政治军事局势的急剧变化直接相关，每次迁都愈益远离战场。到战国中期，随着楚国军事力量向长江上游的大力推进，巴国在渝东长江干流的版图几乎完全被楚鲸吞，巴王室只得退保阆中，而将渝东重镇枳交由巴王子据守。尽管如此，也终究不能阻挡楚国沿江西进的凌厉攻势，更不能阻挡强秦的统一步伐。公元前 316 年秦国平蜀后，移师东进，取巴之重镇江州和阆中，俘虏巴王，巴国由是灭亡。

不过，巴文化并没有因为灭国绝祀而被同时扫荡，仍以各种形式顽强地保存下来。不论从历史文献还是考古资料来看，在渝东鄂西长江干流先是巴地后为楚地的大多数地区，战国中叶以后形成了巴文化与楚文化交织的情况，这就是巴楚文化。它深刻地体现了巴、楚之间相互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互融，这正是巴楚文化形成的直接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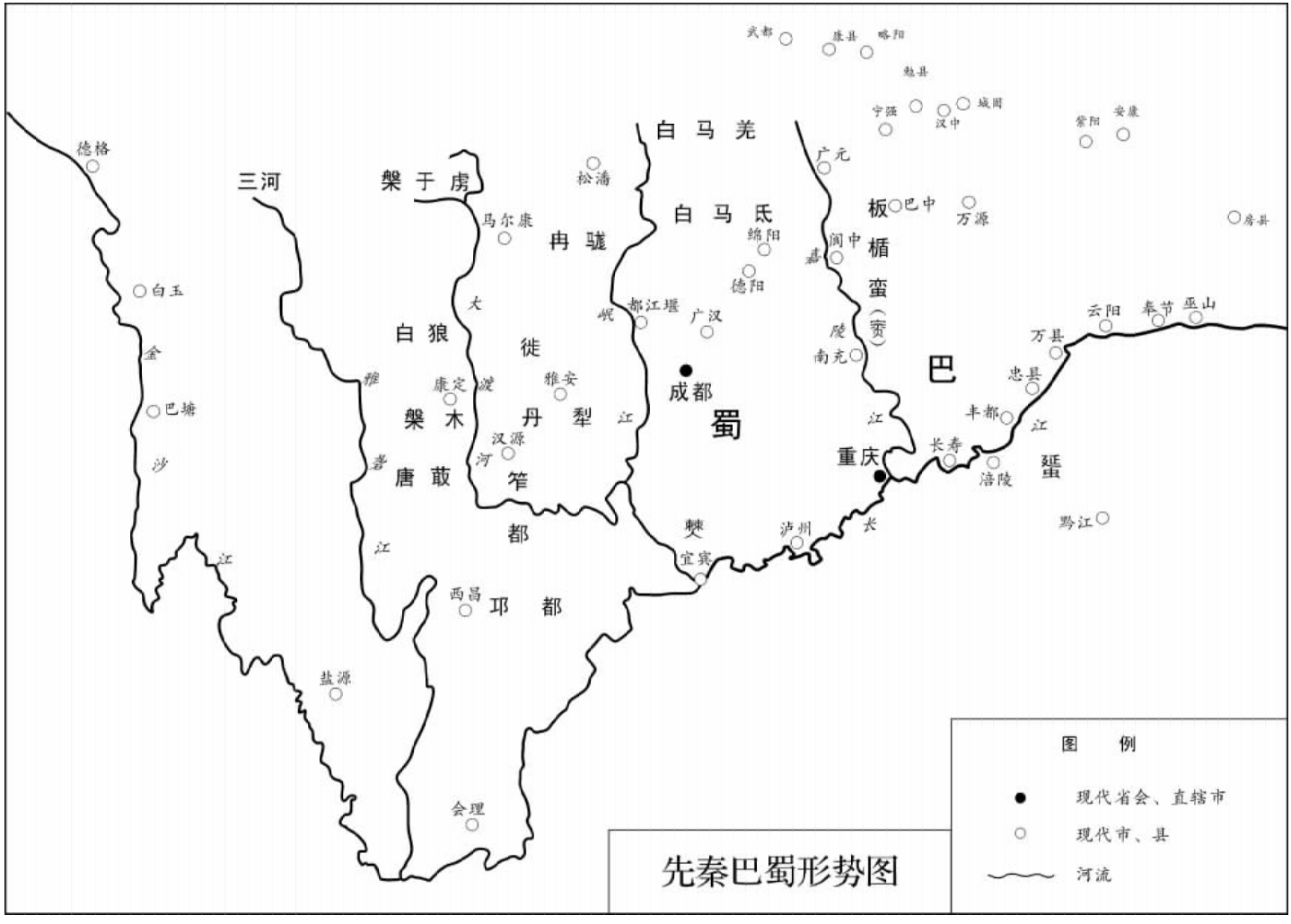
五

先秦时代四川的民族，除巴、蜀两族外，还有众多族类。分布在四川盆地东部地区的，主要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分布在巴蜀以西和以南的，则是汉代所谓西南夷。

西南夷族类有异，成分复杂。按《史记》有关篇章所记，实际上包括西夷和南夷两部分。所说夷，是指《史记·西南夷列传》末句所记的“蛮夷”，它是汉代对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的通称。西、南皆方位词。西夷，即指巴蜀以西的少数民族；南夷，即指巴蜀以南的少数民族。

大体说来，先秦四川各族，除巴、蜀两族外，可以划分为百濮和氐羌两大民族系统，此外还有华夏和百越系统。各系大致分布范围是：百濮主要分布在川西南、四川盆地东部和渝东地区；氐羌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原，部分进入成都平原；百越仅见于四川盆地东部之一部；华夏则多混融于四川盆地各处，其成系统者，仅见于四川盆地东部之一部。先秦四川境内民族的分布情况表明，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四川古代文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武都
康县
略阳
勉县
宁强
汉中
城固
紫阳
安康
房县
德格
三河
槃于虏
松潘
白马羌
广元
板楯蛮（賨）
巴中
万源
马尔康
冉駹
白马氏
绵阳
闻中
德阳
白玉
白狼
徙
都江堰
岷
广汉
陵
南充
巴
云阳
奉节
巫山
万县
金
雅
康定
淀
雅安
成都
蜀
忠县
巴塘
槃木
丹
犁
江
丰都
江
汉源
重庆
长寿
涪陵
蜑
沙
青
河
唐
旄
笮
都
黔江
江
江
长
泸州
僰
宜宾
西昌
邛
都
盐源
会理
图　例
现代省会、直辖市
现代市、县
河流
先秦巴蜀形势图

认识历史　创造未来

——《四川通史》（重修本）序

陶武先

《四川通史》，历时4年，重修面世，此乃四川史坛之盛事！

《四川通史》说的是历史。历史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述兴衰之替、明治理之道的学问。“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历史是由已经过去的众多人、物、事及活动构成的，纵横交错，纷繁复杂。史学家们把历史上看似分散的、孤立的人、物、事联系起来，揭示其相互间的内在逻辑；在阐述“如何而来”的基础上，标示出“现在何处”的时空坐标，进而作出“向何处去”的方向演进和理想求索。这些回答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无论是经验的还是理性的，无论是粗浅的还是深刻的，都将对后世产生作用和影响。因为这种作用和影响，历史便有了现代意义：历史不是死亡的过去，而是“过去”了的“现实”——它使昨天的经验教训能够不断地为后人所“习得”，使人类“曾经’的丰富资源能够不断推动社会实践，使社会的文化基因能够不断地获得重组和创新——作为“过去”了的“现实”，历史理所应当是社会演化的“遗传基因”。对当代人而言，研究历史就是认识“过去”，了解历史有助于创造未来！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四川通史》给人们展现了四川“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让人更系统、更深刻地理解“创造今天”的历史前提。

《四川通史》说的是四川的历史。四川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巴蜀文明是华夏文明的绚丽篇章。特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四川盆地成为人类起源地之一。巫山人的发现，将四川有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到200万年以前。从川中资阳出土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到盆地西南汉源出土的古人类生产工具，显示了四川先民们生息劳作的早期智慧；从都江堰无坝水利工程、世界最早的纸币“益州交子”，到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燊海井问世，展示了巴蜀地沃土丰，“居给人足，以富相尚”的富庶繁荣；从西汉落下闳制《太初历》、文翁崇文重教以化蜀，到宋代唐慎微著《证类本草》、秦九韶著《数书九章》，显现了科教兴川的历史传统；从人类文明诞生初期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到始于唐末、历经五代至两宋完成的大足石刻，展现出巴蜀文化的独特源流；从“移秦民万家以实之”、清代“湖广填四川”，到抗日战争前期的内迁，体现出四川民众的包容与和谐。《四川通史》给世人展示的，是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演进，是川人在巴蜀大地上的开拓创造；告诉世人一个“昨天”的“天府之国”，历代川人曾经的沧海桑田！

《四川通史》说的是四川历史的通史。通史显著的特点是连贯地叙述历史过程的各个时代史实。通史的“通”，既表达融会贯通、一脉相承之要义，全面系统地传承历史，又内含通俗易懂之要求，在体现学术著作严肃性的同时，适合当代人审美情趣和阅读方式，深入而不深奥，浅出而不浅薄。《四川通史》遵循“真实是史学生命”的原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四川地区从远古到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民俗等人文的和自然的内容作出了较为客观和系统的记述。从横向看，它是四川各个时期的断代史；从纵向看，它是四川多个领域的专题史。史中有四川发展的曲折历程之演化，有时代进步的辉煌暗淡之交替，有川人面对灾难自强不息之坚毅，有历代统治者治蜀镇疆之得失。《四川通史》全书7卷400余万字，依据史料，成就文章；详述史实，内容系统；经纬有序，逻辑严谨；表述通俗，图文并茂。可以说在客观、全面地述写四川历史方面是前所未有的。但愿这部史作能够为识蜀、治蜀、兴蜀尽“资治通鉴”之效。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历史是一面镜子，透视真假，折射短长。一部《四川通史》，虽然400余万字难尽蜀中千古岁月，却能够在有限中展示无限，在特殊中探求普遍，在暂时中追索永恒。“一而再，再而三”，知识无限，竭力

而为。虽然本书难免有不足和欠妥之处，但却是作者们不懈努力的精心之作。一日是非在于力，千古是非在于理，“未来的历史”能够给《四川通史》以“历史”的客观评价。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领导和本书主编托我为本书写序，却之不恭，谨以蜀人之心，留此感言。古朴四川已入现代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之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火如荼，蜀地兴旺，蜀人有光！蜀地发展，蜀人有责——历史的主动精神正在昭示我们：以史为鉴，以人为本；思索昨天，把握今天，创造四川更加辉煌的明天！

是为序。

2009 年 7 月 6 日于成都

重修《四川通史》导言

贾大泉

地处我国西南的四川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四川历史既与全国历史有着相同的轨迹，又以其突出的地方特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勤劳勇敢的四川各族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谱写了壮丽多彩的篇章，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为创造和推动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继往开来的新的历史时期，编写《四川通史》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四川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一、重修《四川通史》的缘由和目的

20 世纪 80 年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就着手编撰多卷本的《四川通史》，1993 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共 7 册（卷），213 万字，发行 1000 套。一年之后就一本难求。随着四川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进入 21 世纪后，包括党政部门、学术界和各行各业的人士，更是迫切需要一部四川历史书籍来了解四川的昨天，把握四川的今天，建设四川的明天。但我在 1998 年 8 月退休后，就过着夏到青城山避暑，冬到深圳避寒的“候鸟”生活，对《四川通史》的社会需求未能深入了解。2004 年秋的一天碰见侯水平院长，他谈及此事。我考虑到原《四川通史》出版 10 多年后，四川历史研究又有了许多新的成果，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发现了不少新的史料，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四川历史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解读，因此，需要在原《四川通史》

的基础上，重修一部《四川通史》，以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为此，我们提出了这个建议，并得到原《四川通史》分册主编和社科院领导的支持，上报到四川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协调小组后，被列入2004年的重点课题，成立了由省委领导和专家学者组成的重修《四川通史》编委会，指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具体实施，并给予专项财政补贴。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领导贾松青、侯水平、罗鸣的直接指导下，全体编写人员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重修《四川通史》的任务。全书仍为7卷，共400余万字，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各卷之前，根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四川部分）、任乃强先生编绘的《四川历史地图》与《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以及近年研究成果，相互参校，绘制了相关历史时期的政区地图。同时，每卷新增了彩图，并随文配图1000余幅，使本书成为一部适宜党政干部和史学爱好者阅读的文图并茂的历史著作。

这次重修《四川通史》，是在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四川各个时段的历史作较详实的介绍和客观的解读。我们力求从横向看，它是四川历史某一时段的断代史，从纵向看，把各卷相关内容串联起来，又能初步构成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交通、宗教、民俗等内容的专题史，目的在于能为各行业的干部、群众提供建设四川的历史资源，并从中获取历史智慧、吸取经验教训，增强建设四川的效能。

重修《四川通史》的时间范围仍从远古至民国为止，但5～7卷的时间断限有了重大调整：原第5卷（元、明至清鸦片战争前）改为元明卷；第6卷（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改为清代卷；第7卷（五四运动至1949年）改为民国卷（1912～1949）。这种调整，主要是淡化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主线，不把鸦片战争以后的四川近代历史当做革命史来研究，而是依据政权更替，用新的认识来研究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全部历史，更客观地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原貌。同时也使四川有一部完整的清代四川史和民国四川史的学术专著。

重修《四川通史》的空间范围以1997年3月川渝分治前的四川行政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四川在秦以前为巴国、蜀国之地。秦灭巴蜀，在巴蜀大地建立郡县制的行政区划进行统治。巴蜀不再是我国的行政区划名称，而是作为历史地域名称保存下来。汉以后的封建王朝在地方建立府、州或道、府、州、县的行政区划。唐代按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后分为十五道），其中剑门关以南地区

为剑南道，剑南道的东面长江以北地区为山南道。其后将剑南道分为剑南东川、剑南西川，也称“剑南两川”。山南道则分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唐人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为“剑南三川”。这便是“两川”和“三川”的由来。北宋王朝建立路、州（府）、县制，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在原巴蜀大地设置益州路（后改为成都府路）、梓州路（后改为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四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合称“川峡四路”。两宋之际，官方文书即开始简称“四川”，并绘制《川峡四路图经》，将四路总的人口、物产、地形等上报朝廷。南宋初期为了抗金抗蒙战争的需要，设置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职，统管四川军民财政。此乃“四川”名称的真正来源。元朝建四川行省，“四川省”名正式确定下来。元朝建四川行省时曾将今甘孜、阿坝、凉山地区从四川行政区划分割出去，到明朝以后，这些地区又重新划归四川省管辖。其间除民国 28 年（1939）建西康省，将今凉山州、甘孜州和今雅安市划归西康省管辖（1955 年西康省撤销重新并入四川省）外，1997 年 3 月川渝分治前四川省的行政区域基本上涵盖了从古代巴蜀到民国时期的空间范围。

重修的《四川通史》与 1993 年出版的《四川通史》比较，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虽有较大提高，但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不足、不妥之处。现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认识作些说明，一并提请读者批评指正。

二、四川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

四川地处我国西南内陆腹地，西临青藏高原，北拥秦巴山地，东据长江三峡，南依云贵高原，自古就是我国西南地区与其他地区联系的枢纽和桥梁。特殊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繁荣的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个中心，四个基地”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个中心”是指四川在历史上是我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早在先秦时期，蜀国和巴国就是西南地区著名的古国。春秋战国之际，蜀国大兴水利，地沃土丰，“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成为名冠中华的主要稻作农业区。随着农业的发展，蜀国的冶金、制玉、制陶、竹木器、纺织、矿业等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某些行业的产品在当时还处于领先地位，远销秦、楚、滇、夜郎等古国甚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地，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前 316 年，秦攻占巴蜀，使四川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大

批的中原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技术，四川进入铁器和有汉文字的时代，社会得到飞跃发展，到汉代四川已被誉称为“天府之国”，赶上并超过了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巩固了在西南地区的中心地位。唐宋时期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更走在全国（包括西南地区）的前列。直到明、清和民国时期，四川仍然是我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四个基地”是指四川在历史上是我国开发西南边疆、促进国家统一、推翻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基地。

一是开发西南边疆的重要基地。早在秦朝，中央王朝就把四川作为开发西南边疆的基地。西汉武帝时期，继秦始皇之后，以四川为依托，两次经营“西南夷”，把今凉山、甘孜、阿坝以及云贵的土著民族置于统辖之下，初步完成了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的大业。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同样以四川为基地，进军南中，开发今凉山和云南地区。西晋王朝也是以四川为基地，在云、贵及四川民族地区设州郡，加强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的管辖。直到清代和民国时期，中央政权也是以四川为基地经营西藏，形成了“安康治藏”的政策。民国时期在成都还建有边疆研究机构，出版边疆研究刊物，推动对西南边疆的研究和开发。

二是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基地。我国的大一统始于秦朝。自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之后的2000多年间，基本保持了国家的统一。虽也多次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在历史上我国由分裂走向统一时，四川则成为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基地。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群雄并立的分裂时代。自秦攻占巴蜀，有了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从实力上改变了秦、楚、齐三强并驾齐驱的局面，在经济、军事实力上都远抛齐、楚于身后，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终于在并巴蜀的95年后统一全国，建立秦朝。秦亡之后，项羽裂土封王。汉王刘邦据有汉中、巴蜀之地，依靠巴蜀人力、物力、财力，出兵关中，统一全国，建立汉王朝。西晋王朝建立后，于公元279年依靠巴蜀水军顺长江东下，“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吴主投降。从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出现的全国分裂局面，延续了90年之久，复归统一。公元316年西晋灭亡，我国历史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直到581年隋朝立。588年隋朝依靠巴蜀的人力、物力建立了强大的水师，于589年一举攻下建康，消灭了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朝。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